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部南藏概说

苏 晓 君

明成祖敕令刊刻的第一部官板大藏经,历时五年于永乐15年(1417)在南京告竣^①,这部藏经被通称为永乐南藏,俗称南藏,它的目录题名为“大明重刊三藏圣教”。这部经书雕板存世很久,在不断地修板后使得版式比较凌杂,字体风格不一,良莠相间;不断变化的插图比较粗糙,远不及其后写刻古劲秀雅、装帧厚重大方、印刷清朗的永乐北藏。以流通为佛事的冯梦祯在万历十四年(1586)时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国朝仅有两京之板,而诸方之板尽废。北板稍精,而藏于禁中,请印甚难;南板印造虽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②。由于是“圣祖颁赐,令广印行”^③,因此南藏印刷数量特别巨大,为历来所罕见。万历十二年陆光祖为“缩梵筴而就简编”所书《募刻大藏经(方册)序》一文里就曾提到一个印刷数量的粗略统计:“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所以尊崇佛典特异,既刻大藏经板贮两京,又数出内帑金印造数千部,须天下郡邑、诸名蓝延高僧讲演,而属四民共听焉”^④;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对这部南藏的记载,平均每年刷印20藏。根据这个统计计算,从理论上的推导大约曾有四千部左右经书行世,所以南藏流传下来的印本也比较多。通常认为南藏在万历时有过增刻,经板就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伴随着明代政权存世二百余年^⑤。在这段期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的后印本、增刻本,

它们记录了这部藏经载体外部的流布特征和整体演化情况，考察一下这些记录对于真实深入地了解与介绍南藏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流传下来的经书来看，南藏在长期印制过程中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各部经书间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首先从分函来看，明万历卅五年（1607）僧录司刻印的《金陵梵刹志》第四十九卷收有“南藏目录”一部，目录之前对南藏总体情况有这样一个概述：

每经一藏，共陆百叁十陆函，共陆千叁百叁拾壹卷，壹十壹万伍百贰拾陆张，内全叶壹拾万柒千柒百捌拾贰张，尾半叶贰千柒百肆拾肆张，板共伍万柒千壹百陆拾块。

这段文字便是通常所见到对它总体情况介绍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前在万历二十五年杭州报先寺比丘明觉重刊的《大明重刊三藏圣教目录》三卷本，也与之相吻合，即6331卷经书被分作了636函。这两个目录所作的介绍既没有对部数做出合计，也没有反映出分函的确切状况，实际上在万历增刻之前，这部藏经已经增加了三种两函达到1613部638函。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前人也曾有过提示，只是没曾引起后来人的注意。清朝康熙间江宁府太守陈开虞在《重修修藏社经殿碑记》中提到南藏时曾说过：“（报恩寺）旧有藏经殿，刊刻经板咸贮其中。自永乐庚子缮始后，正统、万历代有增修”，这个记录将第一次增修时间提早到正统年，就是说在南藏刊成三十余年后就曾有过一次增修，而不仅仅是通常认为到约一百七十年后的万历间才进行了增修，他的这个记录与目前了解到的事实基本符合。但这个变化历来却都被忽略了，关于这一点，从下面的统计情况会进一步得到证明。其次每函首册所冠佛陀说法变相图，由于各函首册都要反复使用，雕板因此磨损严重，需要不断更换，而佛像构图虽有一定的规制，但镂刻时也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发挥，所以各部藏经的图像大都不尽相同，同一部经书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的图像；末册的韦陀将军像以及牌记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经板虽然只有一副，原本就未

曾有过统一的图像雕板,各印经铺子都采用各自雕造的图板来印经所造成的;除此之外个别经书的分册也偶有不同,这些就构成了各部南藏之间存在的主要区别点。

国家图书馆分馆收藏有四部不同时期后印和增刻的南藏,时间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嘉靖至万历颁布请经条例之前。分别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太监李朗印本、明隆庆六年(1572)盘山舍利塔寺主持真道印本、明万历初通宝庵等印本和明万历年间增刻本。这些印经者的身份有个人、有寺庙主持,基本上包括了印经者的主要方面。因为印制一部藏经费用比较昂贵,普通的比丘、信士是不可能独自完成的,当然如果能够负担得起,任何人都可以请印,这方面在后来制定的请经条例中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南藏的印制主要是由当地各经铺来完成,印经在经铺的参与下变成了商业活动,并伴随着各种欺诈行为。万历后期曾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颁布了请经条例^⑥,对印经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明文规定。颁布这样一个条例的直接原因是由三起讼状引发,反映出请经者的各种遭遇,条例前有这样一段关于事由的告白:

查万历三十三年四月,该本司呈为申明造经定规事,据湖广、四川等处请经僧本宗、乐闻、古宗等节次稟称,经铺冒滥措勒缘由,据此看得报恩寺藏经板一副,原系圣祖颁赐,令广印行。……查本宗经壹藏多索价至肆十余两,纸绢仍滥恶不堪;乐闻经壹藏,违限至两月;古宗经壹藏,将纸抵充绢。用种种奸顽弊无纪极。……造经独非交易,乃物价半值犹亏,明欺无告易虐,盘费经年累竭,致使流落难归,漠不关情,心亦何忍…今奉前因,合将酌定九号经价并条约,行该寺刻簿立碑,永为定规,遵守施行。

可见这种勒索经价、以次充好、延长时日的现象,已经十分猖獗。这个条例共包含十二款条约与九号经价两项内容,九号经价共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各三号,主要是规定不同等级的用材和相关价目

款项,请经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实力,选择相对应的等级。这个条例的颁布,无疑对于混乱的印经程序,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十二款条约中,第一款有这样的规定“凡请经僧到,不许经铺前路截抢,听其径投”,说明此时繁荣的印经业几为单纯的商业行为;第三款“议杂费”有“本寺禅堂板头银壹拾贰两”,这个数目应为使用经板的费用,它与印经数量紧密相关,并且同第十款“贍禅僧”中提到的“板头银给禅堂贍僧,每年约二十藏,该银贰百肆拾两”的合计数目是相一致的,这个“每年约二十藏”的估算是年印经数量的一个重要信息点,前面推算出南藏行世的数量亦是以此为依据;从第五款“缴号票”的“造经定限三个月”规定,还可以了解到印制一部藏经需要的标准时间;此外第七款“造四经”提到“有止造四经者,共计捌拾肆函,计八百肆拾叁卷。每函价数,照前九号后注,注定计算”,表明除藏经之外是允许特定的单种经书发行的;第八款“装书册”所说“有用太史连印装成书者,纸张装裱听其自办”,太史连就是连四纸属于九号经价的上等用纸,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等级的印制上具有比较大的宽限幅度,不必拘于定制。这个请经条例是对以往印经程序的规范,因此对分析其颁布之前的经书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下就是根据馆藏的这四部南藏存留状况并参照请经条例做出的一些统计与流布情况分析,以种数作单位的各种统计或有残缺。

分类名称 \ 种册统计		种	册	起迄千字文及编号
大乘经	般若部	22种	711册	天1~翔72
	宝积部	34种	166册	龙73~推89

	大 集 部	24 种	137 册	位 90~殷 103
	华 严 部	27 种	220 册	汤 104~体 124
	涅槃 部	7 种	94 册	率 125~驹 134
	五大经外重译经	283 种	501 册	食 135~恃 182
	单 译 经	140 种	233 册	己 183~贤 204
小乘经	阿 含 部	153 种	303 册	剋 205~璧 234
	单 译 经	89 种	169 册	非 235~当 250
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		293 种	389 册	竭 251~安 287
西 土 圣 贤 撰 集		149 种	187 册	定 288~优 306
大 乘 律		25 种	47 册	登 307~从 311
小 乘 律		57 种	446 册	政 312~交 361
大 乘 论		96 种	504 册	友 362~华 411
小 乘 论		37 种	719 册	夏 412~漆 485
续 入 藏 诸 论		24 种	47 册	书 486~岁 490
此 方 撰 述		151 种	1381 册	将 491~野 638
合 计		1611 种	6254 册	天 1~野 638

一、嘉靖卅年太监李朗后印南藏统计

这部藏经保存相对完整,实际种数应为1613种,共缺六函两种残四种,分别为:“剑”4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481~490卷、“木”140《正法华经》十卷、“慎”293《撰集百缘经》十卷、“连”359《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1~11卷、“义”562《天目中峰和尚广录》19~30卷、“州”610《首楞严经义海》11~20卷;除此之外,其他个别地方也间有少部分残缺。“摄”309函10册所收三部经:《菩萨善戒经》一卷、《佛说梵网经》二卷和《优婆塞戒经》七卷是后人墨笔补抄的。每册经折的上下掩面具用蓝靛绫子,在印经等级上属于中等一号类。每函首册的说法图像使用的雕板陈旧、印刷粗糙,本应在各函末册

的韦驮像被这样一段雕刻文字所替代：

切念内官监太监、署丁字库事李朗，宿修何福，今预官班，言行荒疏，虚消重禄。慨光阴之易度，游蚁环思，佛法难逢，盲龟植木，况乃身同露电，景近桑榆，终日因循，此生何赖？由是发心，喜舍俸资三百两，南京印造大藏经律论文，总计六百余函，与崇效寺盖造佛殿中永远供养。倘诸山有德僧众请经披阅，看毕送还，始终完全，勿令欠少。伏愿印经披阅盛事周隆，业障、报障、烦恼障以消除，戒学、定学、智慧学而增长，冤亲普利，恩有均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 大明嘉靖三十年五月初三日吉旦

这里面有三点应该特别注意：主持印经者（太监李朗）、印经时间（嘉靖三十年）和印经花费（三百两），前两点确定了这部藏经的版本，说明印经者不仅仅是僧众，后一点提供了一项印制一部这样等级的藏经在当时所需用的开销。虽然保护佛法、驱除邪魔的韦驮将军像被取代，但在这部经书的最后一册末有墨笔题“南无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普眼菩萨证明”字样，表明形式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它还是注意到了藏经印制的传统风格，即通常表现出来前图后像的对应关系。各函卷后有墨笔正楷题记“会首明善”四字，说明这部经书曾被人认真地诵读过。《广弘明集》三十卷在整部经书的第518“驾”~521“策”函，共计33册，而它在万历初年后印本中分函数没有变化，但册次减少了3册变为30册，这只是两部经书间册数上的变化，没有影响到种数的数量。藏经目录被编排在第628“塞”字函内，共三卷三册，是整部经书的纲目所在，目录终止至“碣”635函，比实有少了3函三种，即：《维摩诘所说经》六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6册“石”636）、《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集注》一卷/（唐）释玄奘译（1册“石”636）、《翻译名义集》十四卷/（宋）释法云编（13册“钜”637~“野”638）。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整部藏经的编制体例，以及各大部类收书情况，但是遗落了“此方撰述”中新增加的内容。

二、隆庆六年盘山舍利塔主持真道印南藏^⑦(残本)

它比上面的嘉靖后印藏晚印二十一年。用材比较讲究，上下掩面俱用天蓝色缎子，依照九号经价来划分应属于上等一号类。这部藏经恢复了韦驮护法像，而各幅图像印刷仍然粗劣。经书中多钤有“舍利塔寺”印记，并在每函末册的碑型牌记框内多用墨笔填写施经主人的姓名，个别有施银数目的记载，如：

盘山舍利塔寺主持真道募造大藏，岳野山寺比丘惠儒施经一函 大明隆庆六年印造(收22)

王田县王家窝庄信士王守成等二十一人共印经一函 大明隆庆六年印造比丘仁广募真道(位90)

盘山舍利塔寺主持真道募造大藏，平谷县杨各庄信士崔隆、庄子峪荣道、常进共施经一函 大明隆庆六年印造(朝106)

盘山舍利塔寺主持真道募造大藏，比丘能成、因住法、安法、保胜，全郭景茂、李文峰、福善寺比丘具便，同施经一函 大明隆庆六年印造助缘齐成(章112)

李锐、刘宗义等六人，比丘能晓、妙智等共施银一两二钱，造经一函 大明隆庆六年造 募缘真道(严246)

最后一条提到的“施银一两二钱，造经一函”，不会是一函经书的实际价格，不然按照六百余函计算，这部藏经的造价未免太高了。牌记更多的题记是：“盘山舍利塔寺主持僧真道募化”，省略了施经者的姓名，这也成为推断主持印经者身份的重要根据之一。这部由真道和尚募造而成的南藏，应是南藏印行的主要方式，它们往往由僧人各地化缘，鼓动信士们虔诚奉佛慷慨施舍，是所谓广结善缘集资而成，个人独资或是官方印制毕竟不多。可惜这部藏经残损严重，只存有152种，576册，但十大部类的经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存留，保存了大致框架；最后一函至“钜”637，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石”636函。

三、万历初年印南藏

函次由“天”1~“野”638,共1614种 6290册,这部藏经是今人配补而成,所以这里记录的统计与实存情况还存在一定出入,由于还未能深入考察,所以只能就目前所见作一些简单介绍。它的印制方式基本上与隆庆后印藏相同,但采用的是黄色扛连纸刷印,多钤有“通宝庵”圆印和“镇海寺”方印,可视为印经的主持者,书中刻印有“南京聚宝门外经坊徐伍铺龙山印行”坊号,这当是印制者的标记。与隆庆后印藏题记不同的是,牌记墨笔所题增加了施经缘由而大都省略了施银数目,如:

奉佛信士冯守珎、韩氏、长男冯信经、苏氏、次冯信书,发心施财印造大般若经一百函,流通检阅。以此功德普报四恩三有,一切有情俱登乐土 万历三年一月吉日印(地2)

奉佛修因信士韩仲峰、刘氏同共发心印造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一部。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情同圆种智 万历三年五月日 印造行(伐99)

奉佛信士张增、周氏,造经一函,用保平安 万历四年七月初八日(在131)

奉佛信士王银朝、李景、万峰、孟钺、孙得时、夏余、郭仲金,发心造大藏尊经一函,流通检阅,普报四恩三有,一切有情同生乐土 万历三年十月(馨268)

奉佛信士郑堂、刘甫林、董守财、吴大川、夏良登,心施财造大藏尊经一函,流通检阅,普报四恩三有。一切有情同登乐土 万历三年十月吉日印行(如269)

这些施经者的意向表达明白,个性化的特色比较突出。这里的印经日期当理解为施财日,否则不可能解释一部经书的印制需要零零散散一年多的时间。此外,这部经书各函首册说法图共一板四折,不同于其他三部藏经每板六折的板式,在佛祖像上方添加的双栏

框中刻印有“教主释迦牟尼说经处”字样,这是其他藏经中所没有的。装帧上显得平常,上下掩面具用靛蓝绢,属于下等一号类。

四、万历间增刻南藏(残本)

通常认为增刻南藏来自永乐北藏中续刻的36部经,共41函410卷。现存的这部藏经残缺较重,下表是对增刻存留情况的统计:

经文	序号	附注
华严悬谈会玄记 四十卷 元释普瑞集 34册	钜637(1-9)、野638(1-7)、洞639(1-10)、庭640(1-8)	缺六卷:卷9、11、17~18、36、39
妙法莲花经要解 十九卷 宋释戒环解 17册	旷641(1-8)、远642(1-9)	缺二卷:卷5、13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会解 唐释惟则会解 6册	邈644(4-9)	存六卷:卷14~19。明时通行十卷本,此本似应为二十卷
大乘起信论疏 四卷 宋释法藏述 5册	岩645(1-5)	前附:起信论疏科文 一卷 宋释子璇录 1册
起信论疏笔削记 宋释子璇录 14册	岩645(6-10)、岫646(1-2、4-10)	存八卷:卷1~7、9~14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注 二卷 唐释宗密述 4册	治649(2-5)	日本宽文九年(1669)始刊黄檗藏增补为四卷
圆觉经略疏之钞 二十五卷 唐释宗密略出 23册	治649(1、6-10)、本650(1、5-10)、於651(1-10)	缺三卷:卷7~9。前附:圆觉经疏前序科文 一卷
维摩诘所说经 六卷 后秦鸠摩罗什译 4册	务653(1-3、5)	缺二卷:卷4、6。此非增刻,由原第石函636调整至此
华严原人论解 3卷 元释圆觉述 4册	兹654(2-5)	

苏晓君:国家图书馆所藏四部南藏概说

折疑论 三卷 元师子述 注 3册	兹654(6-8)	清藏、黄檗藏等多为五卷
教乘法数 四十卷 明释 圆瀚集 29册	稽 656 (1-3、5-10)、叔 657 (3-4、6-10)、载 658 (1-7、9)、南659(2-3、5、 7、9)	缺十一卷: 卷4、11~12、 15、28、30~31、34、36、38 、40
佛祖历代通载 三十六卷 元释念常集 32册	畝 660 (1-6、8)、我 661 (1-10)、艺 662(1-9)、 黍 663(1-6)	缺四卷: 卷 7、9~10、30。 明宣德五年(1430)、隆庆 四~万历六年(1570— 1566)募刻本均为二十二 卷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 钞 二十九卷 唐释澄观 撰述 20册	稷 664 (2-3)、税 665 (2-9)、熟 666(1-10)	缺九卷: 卷 3~11
翻译名义集 十四卷 宋 释法云编 14册	贡 667 (1-7)、新 668 (1-7)	此非增刻, 由原第函钜 637~野 638 调整至此
禅宗正脉 二十卷 明释 如香集 16册	劝 669 (3-10)、赏 670 (1-2、4-8、10)	缺四卷: 卷 1-2、12、19。 明万历卅三年 (1605)释 如岩刻本则为十卷
三教平心论 二卷 元刘 谧撰 2册	黜 671(9-10)	
淄门警训 十卷 明释如 香续集 9册	陟 672(1-4、6-10)	缺一卷: 卷 5。明成化时 曾有二卷本行世
谭津文集 十九卷 宋释 契嵩撰 17册	孟 673 (2-10)、軻 674 (1-5、810)	存十七卷: 卷 1~14、17~ 19。明弘治十二年(1499) 曾有二十二卷本行世
禅源诸詮集都序 唐释宗 密述 1册	敦 675(4)	存一卷: 卷 1。通行本为 四卷

由这个表格可以看出, 这部藏经在增刻经板和编排顺序上也存在一些变化, 比如表中所题鸠摩罗什译六卷《维摩诘所说经》, 原板在“石”第 636 函, 增刻后改为“务”第 653 函, 经板也是重新雕刻的;

《翻译名义集》十四卷宋释法云编，原板在“钜”637~“野”638函，增刻本改在“贡”667~“新”668函。此外在增刻中据现存情况看，在“野”638、“岫”646、“於”651、“税”665、“熟”666、“劝”669函末册刻印有“大明万历十二年七月吉旦慈圣宣文肃皇太后印造”风格不一的字样；自“钜”637函起，字体变为明中后期形成的宋体字。整部藏经牌记可匡分为碑型和花围两种，韦驮护法像自“益”319函始牌记框下方左右两侧印有“南京聚宝门里东廓、经房王奉山印行”印记，“而”318函之前的韦驮像右下角印有“南京三山街经房胡仰山印行”小字，各函首册的说法图舍利佛下也印有“南京三山街第一经房胡仰山印行”字样，而此之后的说法图大体与嘉靖后印藏相同；以往“率”字函十卷《大般涅槃经》特有的行十八字也恢复成了十七字。增刻部分则两像混现，题有王奉山印行的是“钜”637、“野”638、“洞”639、“旷”641、“远”642、“本”650、“务”653、“叔”657、“畝”660、“税”665、“熟”666、“贡”667、“新”668、“劝”669、“赏”670、“黜”671、“陟”672，而胡仰山印行则为“庭”640、“岩”645、“岫”646、“於”651、“穉”656、“载”658、“我”661、“艺”662、“黍”663、“孟”673、“轲”674诸号，这些说明此部经书的印制，分别是由王、胡两家共同来完成的。整部经书统一装帧十分华丽，每册经折的装帧上掩面用彩缎，下掩面分用不同颜色的绫子，属于上等二号类。

在“务”第653函《维摩诘所说经》卷三末有这样一段墨笔题识，明确表示出助刻者的意向：

归安县东林山信官陈梦麟同夫人闵氏捐资助刻《维摩诘经》第三、四卷。功德所翼：现任高爵位福禄重增，名显他邦，万民感仰。夫人凤冠霞佩永享，生长福消灾，身安永寿。祈子子孙孙接武，年年岁岁安康，诸事吉祥者。 万历二十六年 月 日识

而“旷”641函尾还有晚于此四十一年僧人题记，它表达的只是一种祈愿，与印经已无什么关联：

京都敕赐天庆禅寺授僧录司左善逝管司事阳信比丘如
宝，焚香谨叩世尊：愿四海平宁、八方化治、共乐升平。 大明
崇祯十三年岁次庚辰季春姑洗谨诚心印

这部经书中还钤有“总兵都督杨府敬请”、“双泉寺鹫峰造”、“地藏寺碧峰造”等印记，这些自然都不是通常见到的古籍藏书印章，应该是助印者的标识。由此种种来看，这部藏经也应当是多方集资募刻而成。

万历南藏的增刻标志着其规模已有所发展，但增刻的具体时间及主持者尚存在疑问。葛寅亮在万历三十五年正月所作《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曾这样说：“……于北者四十一函，以请藏所入贍。续藏所出需之数年计可具足，则皆予壬寅（万历三十年）摄篆时规始者也。今兹复至杀青，竟且十有四函矣”，由此可知此时北藏增刻已经完成，而葛寅亮万历三十年摄篆时规始的增刻南藏才只刊刻了十四函。前面提到的九号经价前也有“外有续藏肆拾壹函（小注）：今刻过拾肆函，余尚未完工”的记载，参考这两种记录，可见南藏的增刻至少应晚于北藏二三十年，但在经书的记录上却仍照录了北藏增刻时的纪年（即：大明万历十二年七月吉旦慈圣宣文肃皇太后印造），这也就造成了后人诸多疑问之所在，增刻本上的这个纪年对于确定刊刻年来说已没有了实际意义。南藏的增刻是来自北藏的重刻，并伴有经文顺序的调整，是谁做了这些工作，主持其事者的真实身份还难以说清。

南藏的刊刻由于是官板所以具有一定权威性，但它不同于稍后刊成的宫廷本北藏，北藏是专为颁赐各名山大寺所用，每部藏经一般都赐有藏经护敕一道，印制与颁赐都十分规矩而隆重。南藏在印制过程中虽有礼部的监控，但是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尽管后期颁布了请经条例。而众多民间经营的印经铺子各行其是以及不规范的参与，不但加重了印经的商业味道，大量的印制也造成了经书优劣不等的不同风格，这也就是南藏的刻印看上去比

较复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综合考察上述四部经书流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之后,尤其是对于印经数量、分函数目、装帧形式、图像变化、增刻时间等演化特点进行的初步探讨后,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南藏既有如其目录反映出的大致框架及每部经书版式特征,不只一次的增刻使其又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在对繁杂的南藏介绍及鉴定时应该注意到的。

注:

①关于南藏刊刻年有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的是《佛光大辞典》及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等书中的观点。

②《刻大藏缘起》(即五台山刻方册大藏经)。

③见明万历三十四年颁布的《请经条例》。

④见明万历年间刻本《明藏全目·刻经缘叙》。

⑤据清陈开虞《重修修藏社经殿碑记》云,清康熙间经板尚存世。

⑥见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僧录司刻印的《金陵梵刹志》第四十九卷。

⑦经书中几处墨笔题“苏州盘山舍利塔寺……”,此寺的具体位置经查尚难确定。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